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

许宪国

(株洲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1)

[摘要]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从早期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诉说到20世纪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评价, 包含着爱与憎的感情纠结。他以日本为镜子参照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 进而对之进行批判, 这正是明治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一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缩影。

[关键词] 郁达夫; 日本文化; 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 I3/7-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4-0129-04

Yu Dafu's Recogni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XU Xianguo

(Zhuzhou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llege, Zhuzhou, Hunan 412001 China)

Abstract: Yu Dafu's recogni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the early favor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sad telling about weak people to rational evaluation of Japanese culture and Japanese national character in 1930s includes a tangle of love and hate feelings. He takes Japan as a reference to China's na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s, and then makes criticism on them, which is just a miniature of the recognition of Japan of the Chinese who studied in Japan in Meiji Taisho Period.

Key words: Yu Dafu; Japanese culture; national character

1913年9月,随赴日考察司法的长兄郁曼陀东渡日本,到1922年归国,郁达夫在日本度过了十年的留学生活。日本诗人金子光晴回忆郁达夫时曾说:“给我的印象是他简直不像中国人,而更像日本人。即使在东京和他走在一起,大概谁也看不出来他是中国人。他看上去好像很生硬的样子,但一接触却不是那样,这一点很像日本人。至于性格,谈起话来,容易亲近,没有抵触感,让人觉得一见如故。”^[1]金子光晴对郁达夫的描述仅仅是一个日本人的观感,但从中也许可以看出日本生活对郁达夫的影响。对于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郁达夫没有周作人和戴季陶那样专门的论述,但通过他早期的自叙传性质的文字和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文章,尤其是1936年的《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体会

和认识。

纵观郁达夫对日本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其对日本认识也在发生变化,从留学日本和二十年代早期的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的感性诉说到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理性分析。这种变化既有郁达夫思想成熟的因素,也有与日本的时间空间和心理距离扩大的影响。作为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郁达夫的日本认识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烙印。对于日本,他怀着爱与憎、排斥与留恋的复杂情感,被日本文化吸引而又感受着弱国子民的悲哀,由日本国民性的优点而反思批判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日本正如一面镜子,从镜子里看到的是自身的形象,这种对日本的矛盾纠葛的复杂心态,正是明治大正时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

收稿日期: 2012-03-07

作者简介: 许宪国(1973-),男,吉林白山人,株洲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认识的缩影。

一 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

从18岁到27岁,正是一个人思想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从封闭、保守的本国来到明治维新后正展现出蒸蒸日上的活力和气息的大正时代的日本,郁达夫思想和情感受到极大的冲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胃病》和《怀乡病者》等几篇均写于日本。与他1922年归国后所作的小说相比,日本时期的作品中给我们留下强烈印象的就是那主人公“中国人”的身份感——耻辱、愤懑的民族自卑感。

但对于郁达夫来说,弱国子民的悲哀并不是他日本认识的全部,正如小田岳夫在谈到《沉沦》时所说的:“然而,郁达夫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是否仅仅只抱着这样的感情呢?笔者不以为然。相反,大正时代的日本——那灿烂的文化空气,平和的气氛,含义深广的大自然,少女的温柔娇美等等,恐怕都使得他感得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吧……”^[2]

郁达夫在1922年的《归航》一文中说:“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意第二次再使他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3]“不忍诀别”的心情是因为“厌恶的情太深了”,真实表现出了郁达夫矛盾复杂的心态。厌恶而又留恋,不仅是在日本耗去了他十年的青春,其实还有隐藏在他心底的对日本文化、生活的欣赏和喜爱。

(一) 异域文化情调的吸引

日本文化和生活对于明治大正时代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来说,其吸引力无外乎两个方面:异域的文化情调和本民族文化的痕迹。郁达夫在1935年的《海上》一文中曾回忆初见日本时的感受:“船到了长崎港口,在小岛纵横,山青水碧的日本西部这通商海岸,我才初次见到了日本的文化,日本的习俗与民风。后来读到了法国罗底的记载这海港的美文,更令我对这位海洋作家,起了十二分的敬意。嗣后每次回国经过长崎心里总要跳跃半天,仿佛是见到了初恋的情人,或重翻到了几十年前写过的情书。长崎现在虽则已经衰落了,但在我的回忆里,它却总保有着那种活泼天真,象处女似地清丽的印象。半天停泊,船又起锚了,当天晚上,就走到了四周如画,明媚到了无以复加的濑户内海。日本艺术的清淡多趣,日本民族的刻苦耐劳,就是从这一路

上的风景,以及四周海上的果园垦植地看来,也大致可以明白。蓬莱仙岛,所指出不知是否就在这一块地方,可是你若从中国东游,一过濑户内海,看看两岸的山光水色,与夫岸上的渔户农村,即使你不是秦朝的徐福,总也要生出神仙窟宅的幻想来,何况我在当时,正值多情多感,中国岁是18岁的青春时期哩!”^[4]

“初恋的情人”的比喻可以看出郁达夫对日本的感情,绝非一个“厌恶”那么简单。从此一大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最初吸引郁达夫的正是日本异域的文化情调——明媚的风景、清淡多趣的艺术和刻苦耐劳的民族性。这三个方面恰恰就是后来他30年代评价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基调。

(二) 中华文化痕迹的心理慰藉

除了日本的异域文化情调外,作为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日本,在当时还保留着许多中华文化的痕迹,这带给身居异国的中国人的是心理的慰藉和温馨。1921年,郁达夫中英文并用,写了有名的游记《盐原十日记》。游记里有两首诗:“秋夜河灯净夜庵,兰盆佳话古今谈。谁知域外蓬壶岛,亦有流风似汉南。”“桑间阶上月无痕,人影衣香舞断魂。绝是江南风景地,黄昏细雨赛兰盆。”^[5]从这两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出郁达夫对日本的喜爱,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从日本文化中找寻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子。

其实对于明治和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来说,正是日本文化中中国文化的痕迹使他们倍感亲切。比郁达夫更早留学日本的鲁迅和周作人就是如此。今村与志雄和松枝茂夫在《鲁迅的故家·解说》中在谈到周氏兄弟时说:“(周作人)每天晚上,只要有闲暇,便身穿和服、脚踏木屐,到神田和本乡一带的新旧书店及夜间商店去,他为在日本的庶民生活中,发现在中国已经失去了的唐代的风俗习惯而兴奋。……他所以会对日本的庶民生活(及其艺术)如此感到亲近,一是因为日本的风土与他的故乡绍兴很相像;二是被伴随着革新的复古思想所吸引(鲁迅也同样)。”^[5]今村与志雄、松枝茂夫的话不仅可以用于论说周氏兄弟,对于明治大正时代留学日本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恰当的。

(三) 面对日本的矛盾复杂的心理和情感

在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中,他尽情地宣泄着在异国他乡的留日学生感受到的耻辱和国家贫弱的悲哀,甚至可以说弱国子民的悲哀正是他早期自叙传小说的主要情调,这在诸多的郁达夫研究中均被提及和强调。弱国子民的悲哀与对日本文化的喜

爱纠结于郁达夫心中,使他对日本的情感呈现出矛盾复杂的鲜明特点。

郁达夫在1922年的《归航》一文中说:“我将要离开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3]

在表达了对日本生活的留恋后,郁达夫又说:“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了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自杀的时候,最后浮上我的脑子里来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哩。”^[3]郁达夫在离开生活了十年的日本时矛盾复杂的心态在这两段文字中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

几乎在郁达夫所有涉及日本的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受到民族歧视后的感伤和悲愤与对日本文化生活的喜爱和眷恋,既有弱国子民的感伤,也有国家贫弱的悲愤,更有“初恋情人”般的留恋,矛盾复杂纠缠于胸中,使他早期的日本认识表现出感性的情感宣泄的特征。

二 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评价

相对于留学时期和20年代早期,郁达夫30年代对于日本的文化的认识开始趋于理性,感性的情感宣泄为理性的评价所代替。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在1936年的《雪夜——自传之一章》和《日本的文化生活》等文章中,尤其是《日本的文化生活》,是郁达夫为数很少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研究的专论。

(一)对日本文化的评价

对日本文化,郁达夫主要谈到了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文化的模仿性;二是日本文化的独特性。

关于日本文化的模仿性,郁达夫在《雪夜——自传之一章》中说:“日本的文化,虽则缺乏独创性,但她的模仿,却是富有创造的意义的;礼教仿中国,政治法律军事以及教育等设施法德国,生产事业泛效欧美,而以她固有的那种轻生爱国,耐劳持久的国民性做了中心的支柱。根底虽则不深,可枝叶却张得极茂,发明发见等创举虽则绝无,而进步却来得很快。我在那里留学的时候,明治的一代,已经完成了它的维新的工作;老树上接上了青枝,旧囊装入了新酒,浑成圆熟,差不多丝毫的破绽都看不出来了。”^[4]

对于日本文化的模仿性是差不多是当时和现在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一种普遍认识,当然也有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周作人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

发达》一文中就提出:“我们平常对于日本文化,大抵先存一种意见,说它是‘模仿’来的。西洋人也有人说,‘日本文明是支那人的女儿’。这话未始无因,却不尽确当。日本文化,大约可以说是‘创造的模仿’。”^[6]郁达夫与周作人在看待日本文化的模仿性方面,都特别提到了其创造的意义。

当然,郁达夫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并不仅仅局限于它的模仿性。真正吸引郁达夫的是日本的文学和艺术的独特性,这契合了作为作家的郁达夫的心性。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中,郁达夫谈到了日本的文学、音乐、舞蹈、建筑、茶道、插花、服饰等艺术,以细腻的笔触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字里行间渗透着喜爱与欣赏之情,甚至对某些日本文化的喜爱胜过了对本国艺术的喜爱:“以单纯取长,以清淡制胜的原理,你只教到日本的上等能乐舞台或歌舞伎座去一看,就可以体会得到。将这些来和西班牙舞的铜琶铁板,或中国戏的响鼓十番一比,觉得同是精神的娱乐,又何苦嘈嘈杂杂,闹得人头脑昏沉才能得到醍醐灌顶的妙味呢?”“还有秦楼楚馆的清歌,和着三味线太鼓的哀音,你若当灯影阑珊的残夜,一个人独卧在“水晶帘卷近秋河”的楼上,远风吹过,听到它一声两声,真象是猿啼雁叫,会动荡你的肺腑,不由你不扑簌簌地落下几点泪来;这一种悲凉的情调,也只有在日本,也只有从日本的简单乐器和歌曲里,才感味得到。”^[4]

郁达夫所说的日本文学和艺术中的“悲凉的情调”,和周作人所说的“东洋人的悲哀”,^[7]正是明治大正时代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文化的普遍而真实的感受,或者说,正是日本文化中“悲凉的情调”契合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情。

(二)对日本国民性的认识

郁达夫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之久,对日本国民性虽没有专门的论述,但不多的文字中依然可以看出其深刻的认识。他对日本国民性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点:日本民族“刻苦精进”的精神和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

对于日本国民性,郁达夫提到了“轻生爱国,耐劳持久”,但他特别着意的是日本民族的“刻苦精进”的精神。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中他说:“正因为日本一般的国民生活是这么刻苦的结果,所以上下民众,都只向振作的一方面去精进。”^[4]对日本人的“刻苦精进”的民族性,鲁迅也曾经明确地指出过:“那认真是应该承认的。我把两国人民比较了一下。中国把日本全部排斥都行,可是只有那认真,却断乎排斥不得。”^[8]虽然表述不同,但鲁迅

与郁达夫对日本国民性有向的指向是一致的、肯定的。

同时,郁达夫也注意到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刻苦精进,原是日本一般国民生活的倾向,但是另一面哩,大和民族,却也并不是不晓得享乐的野蛮原人。不过他们的享乐,他们的文化生活,不喜铺张,无伤大体;能在清淡中出奇趣,简易里寓深意,春花秋月,近水遥山,得天地自然之气独多,这,一半虽则也是奇山异水很多的日本地势使然,但一大半却也可以说是他们那些岛国民族的天性。”^[4]

郁达夫不仅被日本文化、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所吸引,也喜爱日本的日常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正是文化和国民性的具体体现。在《日本的文化生活》一文中,他说:“若在日本久住下去,滞留年限,到了三五年以上,则这岛国的粗茶淡饭,变得件件都足怀恋;生活的刻苦,山水的秀丽,精神的饱满,秩序的整然,回想起来,真觉得在那儿过的,是一段蓬莱岛上的仙境里的生涯,中国的社会,简直是一种乱杂无章,盲目的土拨鼠式的社会。”^[4]

三 作为国民性批判参照物的日本文化和国民性

郁达夫关注日本的文化和日本国民性,并不仅仅为了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情,他往往把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作为参照,提出对中国文化和国民性的批判。在《雪夜——自传之一章》中,他在谈到日本文化的模仿性后说:“新兴国家的气象,原属雄伟,新兴国民的举止,原也豁达,但对于奄奄一息的我们东方古国的居留民,尤其是暴露己国文化落伍的中国留学生,却终于是一种绝大的威胁。说侮辱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不过咎由自取,还是说得含蓄一点叫作威胁的好。”^[4]在谈到日本国民的“刻苦精进”时他说:“明治维新,到现在不过七八十年,而整个国家的进步,却尽可以和有千余年文化在后的英法德意比比;生于忧患,死于逸乐,这话确是中日用国一盛一衰的病源脉案。”^[4]

日本在郁达夫的视野里,是作为一面镜子来反观自身的,时时具有警醒中国人的意义。他说:“只在小安逸里醉生梦死,小圈子里夺利争权的黄帝之子孙,若要教他领悟一下国家的观念的,最好是叫他到中国领土以外的无论那一国去住上两三年。”“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问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

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4]

冈崎俊夫在《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一文中说:“大正初年的‘新兴国家的气象’‘新兴国民的举止’也许确实与今天有所不同,但那也绝不是尧舜之世,光明的反面有黑暗,而且黑暗正在急速地蔓延。尽管如此,中国的留学生们更多地还是注意这此好的一面这无疑是由于他们把当时的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的结果。因为自己的国家过于黑暗了,所以只要别的国家比自己国家的状况好一点,就会加倍地注意那些好的地方。”^[9]

冈崎俊夫的评价不仅对于郁达夫,也指出了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时所表现出的态度,他们通过与日本的对比,寻找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的弱点,并对之进行批判,希望以此来实现民族的振兴。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人本国民性的认识,无论是早期的感性的宣泄还是30年代的理性的评价,是近代西方冲击下民族危机刺激下的反应,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评价,不是单纯的文化研究,而包含着明确的对本国文化和国民性批判的现实目的。

参考文献:

- [1] 伊藤虎丸、稻葉昭二、鈴木正夫. 郁達夫資料補編[G]. 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一刊行委員會,1974.7:205.
- [2] 许子东. 郁达夫新论[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217-218.
- [3]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3)[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7,14-15,18,21.
- [4] 郁达夫. 郁达夫文集(4)[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29,92-94.
- [5] 今村与志雄·松枝茂夫. 鲁迅的故家·解说[A]. 周遐寿. 鲁迅的故家[M]. 东京:筑摩书房,1958:321-322.
- [6] 周作人.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A]. 艺术与生活[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33.
- [7] 周作人. 谈日本文化书[A]. 瓜豆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8.
- [8] 内山完造. 鲁迅先生[A]. 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17.
- [9] 冈崎俊夫. 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J]. 文学:东京:岩波书店,1953(9):36-38.

责任编辑:李珂